

# “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傅璇琮先生访谈录

谷竞恒

傅璇琮，浙江宁波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助教。1958年调商务印书馆，旋调中华书局任职。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编审，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现任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曾担任《续修四库全书》、《全宋诗》、《唐才子传校笺》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主编）获1999年国家图书奖，《唐才子传校笺》（主编）获全国第一届古籍整理优秀著作二等奖。主要著作有《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唐诗论丛稿》、《唐翰林学士传论》等。本刊特委托中国人民大学谷竞恒博士就有关治学问题采访傅璇琮先生，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 一、少年心事当拿云

谷竞恒 我们还是先从您的家庭谈起。您是浙江宁波人，祖辈或父辈有无家学渊源？

傅璇琮 没有，我父亲叫傅贤弼，是经商的，但从小他教我一些古文，譬如说，有一次给我讲苏轼的《前赤壁赋》，并让我背，所以这篇赋我现在都背得出来。年轻时学这些东西是记得很清楚的。

谷竞恒 您父亲能讲《前赤壁赋》，说明有一定的文学素养。

傅璇琮 是吧，他的字写得也不错，但没正式上过学，完全是自己学的。

谷竞恒 您父亲是否特别重视教育？

傅璇琮 小时候在农村，是在外公、外婆家住

的。旧社会上私塾，后来我到了宁波市，考试后直接上小学四年级，此前都是学《三字经》、《千家诗》这些东西。我记得宁波老家藏有一部李善注的《昭明文选》，在上小学时常常得便拿来翻看，虽然看不太懂，但是感到辞藻很美，读起来有一种特别的愉悦。

谷竞恒 听说您在宁波中学时就开始写东西，并向当时有名的中学生期刊《开明少年》投稿。

傅璇琮 呵呵，这真是勾起了我的回忆。《开明少年》是开明书店的夏丏尊、叶圣陶主编的少年读物。最早在宁波中学的一个老师，叫吕漠野，他向我们推荐过，我在念初中的时候，正是解放战争时期，我还订过上海的《大公报》，这都是比较倾向于进步的报刊。我当时主要的课外读物就是一个《大公报》，另一个《开明少年》。开明书店很有名了，夏丏尊、叶圣陶这些人的思想都很进步的。我记得写过

两篇文章投给《开明少年》，一篇讲国民党统治下，老百姓生活在苦难当中，还有一篇讲选举，蒋介石为了选举而耍阴谋诡计。现在友人把我的这两篇少作都找出来了。

谷竞恒 中学时，您的求学理想是什么？想过子承父业、继续经商吗？还是愿意读书深造？如果想读书深造，您当时最心仪的大学是哪所？

傅璇琮 我当然想继续读书深造，在我看来，读书是人生最惬意的事情。当时我所在的宁波中学，是浙江省的重点中学，师资力量是比较强的。按照道理，我1951年的冬天才高中毕业，可是在1951年的夏天，我就提前参加高考。因为根据那时的规定，虽然还差半年毕业，但是同等学力也是可以考的，于是我就提前报考清华大学了，我对清华有特殊的感情。考试时心情很放松，想着反正我还差一学期才毕业，没考上可以再回来念书的，结果一考就考上了。

谷竞恒 您中学时代最喜欢读谁的书，我后来看您的文章，好像您对朱东润先生很感兴趣。

傅璇琮 因为《开明少年》提到过朱东润先生，后来我给《开明少年》写稿子，虽然没有稿费，但是给可以买书的书票，这也很好啊。于是我就买书，我记得就买了朱东润先生写的一些传记，如《张居正大传》，读了很受启发，当然有些东西我那时看不懂。念初中时，还没解放，我对文科比较注意，特别喜欢的是文学。

谷竞恒 您当时考清华大学就报的中文系？

傅璇琮 是，报的中文系。

谷竞恒 当时为什么不考北大呢？

傅璇琮 这和我的思想有关系，我是南方人，对北方的学校不太了解。当时我读过几篇介绍清华大学的文章，认为清华是比较民主开放的，而且清华毕业的学生出国的特别多，往往一毕业就到国外去了。

谷竞恒 清华最早是留美预备学校。

傅璇琮 我在宁波时，师友们的一般看法是：清华比较自由，倾向进步，民主开放，而北大比较传统化，底蕴深厚。其实当时年纪小，也不懂什么，只是觉得清华这个地方似乎更能吸引我，于是就考了。等到我真正进了清华以后，确实感觉不一样。解

放初期，当时清华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李广田先生，他是作家，搞文艺理论的，搞语言文字的陈梦家先生也很有名，新诗写得很好，当时有名的学者很多的……我觉得清华还有个优点，我们一般上课集中在上午，下午的课就比较少，可以自由安排，这个对文科学生很重要。

谷竞恒 自由空间多，可以博览群书。

傅璇琮 对的。我记得王瑶先生在清华给我们讲《现代文学概论》。

谷竞恒 他不是讲中古文学、文学史吗？

傅璇琮 他那时在清华不讲中古文学，是讲现代文学的。他有个特点，对我影响比较大。当时清华大学图书馆地下有报纸的阅览室，订了全国各地省一级的报纸，据说王瑶先生差不多两天、三天就要去浏览一下。我也学他，经常去看报纸，而且养成了习惯，不仅北京的报纸，包括很多的地方报纸都看，譬如上海的《文汇报》就很愿意看，我认为这对自己较有好处。

谷竞恒 阅读面很广。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变化很快，高等教育也是风云变幻。

傅璇琮 是的。我是1951年的秋天进清华，结果才上了一年，1952年就院系调整了。当时向苏联学习，高等教育的布局做了很大的调整。在清华虽然只读了一年，但对我后来的治学思路还是比较有影响的，因为清华自上个世纪20、30年代以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等诸位先生，他们古今贯通、文史结合，这对我的影响比较深。

谷竞恒 清华形成了它自身的独特治学路数。

傅璇琮 我虽然只在清华一年，但真很受益。北大的老师是比较忙的，而清华的老师就和学生的接触比较多，比如李广田先生是系主任，他“十一”国庆节上午到城里去，下午就到我们宿舍里来看学生。

谷竞恒 国庆节来看学生？

傅璇琮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生，刚入学的，一年级啊。他到我们宿舍里来转转。

谷竞恒 节假日系主任到宿舍看学生，现在很少了。

傅璇琮 还有，譬如说，陈梦家先生，原来诗写得很好，他这个人很有个性，他的夫人也是搞学问的。陈梦家先生当时就住在燕京大学的燕南园，

离清华比较近。我们到他家去过两次,他邀请我们星期天下午去他家,一边喝咖啡、吃小点心,一边海阔天空地闲聊。这在那时被认为是很奇怪的。

谷竞恒 今天看起来很有“小资情调”啊,就是搞“party”、小沙龙。

傅璇琮 其实这种方式很好的。而且陈梦家先生讲课也很奇怪。他没有什么讲义,兴之所至,随意生发,比如讲讲我这几天碰到什么人,讲了什么话,在公交车上遇见什么人,诸如此类,课上四分之一都在说这些。好像王瑶先生也喜欢讲题外话。一年后我们就被调整到北大了。北大那时好像对分数很重视,但在清华,考试的分数并不是那么看重。清华一学期完了,也要考试,后来分数就公布在“工字厅”,可是我都不知道,等到过了很久,第二学期了,我才发现自己的分数贴在“工字厅”。

谷竞恒 您虽然只在清华呆了一年,但感觉对清华的感情特别深。那清华同学之间交流多吗?

傅璇琮 清华当时很奇怪,虽然都解放了,但制度上还是向英国大学学习。比如纪律性很奇怪,早上有规定,不到6点半,一定去操场锻炼跑步,下午4点半以后就不能待在图书馆了,要出来活动。老师不太管,高年级学生管低年级学生,低年级要听学长的。好像英国学校就是这样。

谷竞恒 特别注重学生身体锻炼,后来清华操场上有个大标语“为祖国健康工作一百年”,也很有特色。

傅璇琮 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有责任,特别是早操,他们都来管的。这方面清华很有特色。

谷竞恒 您记得清华都开有哪些课?

傅璇琮 现代文学概论、语言文字概论、文艺学引论。

谷竞恒 教师分别是王瑶先生、陈梦家先生和李广田先生?

傅璇琮 主要就是这三位。

谷竞恒 语言文字概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傅璇琮 都有。

谷竞恒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放在一起,和现在不一样的,放在一起似乎更好。

傅璇琮 还有中国通史,由历史系的两个教师来讲。

谷竞恒 上了一年后到北大,院系调整,搞成“航空母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所名校的中文系都合并到北大去了。

傅璇琮 好多教师都集中在北大,也有些到别的地方,如去南开大学、社科院,像余冠英先生就到社科院去了,王力先生则从中山大学调来。

谷竞恒 那时北大中文系的师资力量无疑是全国第一的,只不过是行政命令造就的。

傅璇琮 客观地讲,这样改革是利有弊的。对清华来说起码是不公平的。其实当时清华的文学、历史等方面都有很好的传统,很可惜,行政命令给砍掉了,让清华变成了纯粹的工科学校。这样一来,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清华没有文史学科了。这的确很可惜。我曾经专门写文章讨论过清华的学风,根据我的体会,清华的学风大致有三点:一是视野开阔,不局限于某一细小局部,能从一个时代的文化总体来把握所研究的课题;二是贯通古今,有一种“史”的通识;三是对中华的历史和文化有强烈深沉的爱,同时在清理传统时总保持一种理性的自觉,产生一种真切的求知欲和对学问追求的责任感。

谷竞恒 听得出您很怀念清华。您又在北大读了三年,受了好多著名学者的亲炙。

傅璇琮 对的,单是《中国文学史》这门课的教师,阵容就很强大。先秦到两汉是游国恩先生讲,包括文学史、文学作品选讲都在一起,当时一个星期有六节课,分三次。魏晋隋唐五代,林庚先生讲,宋元明清,浦江清先生讲。

谷竞恒 浦江清先生之后是不是吴组缃先生?

傅璇琮 吴组缃先生主要是讲小说。因为宋元明清部分很多是诗文,还有词。这几位先生都是久负盛名的,治学路数也不一样,游先生是特别强调实学,不能游谈无根。林先生则从文学欣赏的角度切入。

谷竞恒 林先生特别有感悟,属于有灵气的那种。

傅璇琮 他讲课我们听着特别感动。平心而论,林先生也搞考证,但是他对作品的感悟理解太好了、太精彩了。浦江清先生我可以多讲几句,因为他去世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的不多了。我后来留

校，就是做浦先生的助教。浦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期间受王国维、陈寅恪等先生的影响，致力于文史考证，主张在一般学者忽略之处深入钻研，发前人所未发。后来又受闻一多、朱自清诸先生的影响，主张精读原著，结合前人的成就，融会贯通。总之浦先生有自己的特点，他的文章很少，现在就薄薄的一本《浦江清文录》，但他每篇文章都有价值，都能解决问题。除了《八仙考》外，《花蕊夫人宫词考证》、《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等论文都是极见功力的。我曾经概括浦先生的研究方法和治学途径是“诗史互证，情理兼融”，不知道是否确切。浦先生的词曲讲解细腻极了，“平林漠漠烟如织”的“平林”二字，浦先生能把它与“青林”、“芳林”、“春林”等作比，那种高度的鉴赏能力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谷竞恒 但是像浦江清这样的学者，如果生活在今天的大学里，恐怕“考核”未必能过得去啊。

傅璇琮 说到这里，我也很有些感慨。我倒觉得现在的大学管理在这些方面可以学学过去，目前大学管理“量化”得太厉害了。须知文科的研究成果绝不是以量多取胜的。浦江清先生当年留下来给陈寅恪先生做助教，平常也不怎么写东西的，一方面搞教学，一方面自己看书，没有自己的发现是轻易不动笔的。他在1951至1952年写了小册子《屈原》以后，就没怎么写了，但是学问非常扎实。林庚先生写的也不多啊。

谷竞恒 对。现在都量化了，特别不好，动辄要多少字、多少篇。

傅璇琮 现在有人一年能写出一两本书来，甚至更多。过去的学者，他们的优点是重视学术，不断地钻研，而且不受外界干扰影响。陈寅恪先生给邓广铭先生写的《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言里，也提到这点。这方面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还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 二、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之志

谷竞恒 一个人的一生，经历是非常丰富的，既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春风得意，也难免走麦城的坎坷挫折。您从毕业留校之后，并没有大展宏图，相

反却逐渐步入了人生的低谷。好像您在毕业前还有一点小小的波折，因为翻译苏联作品，说是和胡风挂上了关系？

傅璇琮 那是1955年，快到毕业的时候。我大学一年级在清华学英语的，院系调整后都改学俄语了。学了之后，就试着翻译一些俄语的东西，前后翻译了几篇苏联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因为和上海文艺出版社有联系，就给他们了。后来全国展开声势浩大的批胡风运动，他们说文艺出版社是胡风基地，还查到有傅璇琮这个人，又是北大的，于是就来调查我了，北大党委专门派人找我谈话，进行政治审查，我在班上也受到孤立，情绪很低落。其实真是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关系。

谷竞恒 结果还算公平，毕业让您留校了。

傅璇琮 后来没有事，就算了。我是那年我们班上惟一个留校的，任古代文学助教。

谷竞恒 1955年夏天留校，您做了浦江清先生的助手。是系里安排的，还是浦江清先生要的呢？

傅璇琮 自然是系里安排的，当然也要互相了解一下，浦先生对我印象很好。

谷竞恒 刚才您说到心态，可能从您毕业到70年代后期，差不多二十多年的时间中您长期处在逆境之中。我想请您谈谈您在逆境当中的思想或者心态。我有时读您的文字，很感动，您的身上有一种坚持的品质，在那种环境下，您还能持久不断地读书，自己的文章虽然不能写了，但是领导布置您写介绍说明文字、搞资料编辑，您都是非常认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您当时觉得心里还有希望吗，当时的真实心态是怎样的？

傅璇琮 当时因参与筹办所谓“同仁刊物”和乐黛云、褚斌杰等被错划为右派，时在1958年的1月，3月就从北大调到商务印书馆了，7月商务又和中华书局分工调整，于是最终在中华书局落脚。那时我虽然戴上政治帽子，但并没有灰心，还想着要好好做编辑，我觉得应当编辑学者化，做编辑也是有希望的。到中华书局后，被分配到古代史编辑室。社里出了一本书叫《刑襄题稿·枢垣初刻》，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叫我写出版说明。这是明末清初一个官员的奏议，颇有史料价值。这个出版说明，照理应该是老编辑写的，而灿然同志



竟然让我这个只有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写,真有些诚惶诚恐。当时我确实好好看了书,谨慎小心,勉力为之,终于写成两三千字的小文。后来到文学编辑室,又让我写《诗经通论》的出版说明,就是清代姚际恒的。我在学校里没有看过这部书,这次差不多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先后把《诗经》和姚著都好好看了一遍,才写出两三千字的出版说明。像这样的小文章今天看起来自然不算什么,可是在那时,政治上受压抑的我真有一种受信重的感激之情啊!在中华书局的特殊环境里,我觉得要做学术研究,是不必在乎什么政治压抑的。当时不能写文章,不能发表,我就集中搞文献资料,比如宋代的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等。那时的干劲真足,平时从单位图书馆里借书,夜间翻阅。每到周末,就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泡一天,中午就着白开水吃自己带的馒头聊算一顿午餐。时间一长,我得了严重的胃病,还一度住院治疗。不过近百万字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也终于完成。1960年右派帽子摘掉了,可以发表文章了。由此我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做学问,确实不必有什么政治牵挂之虞和世态炎凉之感,就像我为《李德裕年谱》新版题记所立的标题:“一心为学,静观自得。”

谷竞恒 我很能理解先生当年一心做学问的志向。您当时用的笔名?

傅璇琮 是,最初用的是笔名,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这两部资料汇编是我编的。

谷竞恒 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是不是最想做学术研究?

傅璇琮 大学毕业的时候先搞教学,也写过几篇文章,我搞研究工作主要还在编辑部。很多人认为做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其实做编辑工作也有优点的,一是面比较广,比如教学就教某一门课,而编辑这个月我看《诗经》的稿子,也许下个月又是明清诗集什么的,再下个月则是笔记小说之类的,总之接触面特别广,而且不同的书稿有不同的思路,所以做编辑工作在这方面比较有特点。其实我们国家不少有名的老编辑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长期的编辑生涯,令我在审稿、组稿中,与学术界多有交往,在前辈学者中,我与钱钟书、启功、夏承焘、吕

叔湘、林庚、王世襄、马茂元等先生,都甚有学术情谊,他们的治学思路和研究特色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我想说,一个人即使长期在出版社工作,不在大学或研究所,也能学有所成的。我一直认为人应当有自己的一种志向。我当时就立下一个志愿:我要当一个好编辑,当一个有研究水平的编辑。

谷竞恒 按照我的理解,您是把做学问视为自己的生命的。王国维先生讲做学问是目的,不是手段。陈寅恪的名言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您始终是循循善诱的,看上去很谦和,给人感觉虽然瘦小,但精神刚强坚毅,骨子里有一种傲气。

傅璇琮 你太过奖了。不过,我搞学问这方面倒是如此。记得1993年生病住院,医院怀疑我是胃癌(其实不是),于是转到肿瘤医院去。当时我到肿瘤医院住了二十多天,还把校样拿到病房去看。

谷竞恒 您心里不觉得怎样,没把生病当回事。

傅璇琮 上午还在病房,下午就到医院的院子里看校样去了。

谷竞恒 我看您的《濡沫集》,谈干校经历,大家都走完了,您还在那儿读书。

傅璇琮 干校那时候比较忙,后期他们都走了,我就看书。

谷竞恒 我觉得读书写作中自有一种愉悦。其实那时候,在艰辛环境里受苦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您这样“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

傅璇琮 我的第一本专著就是《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里面的文章都是“文革”后期和“文革”结束以后陆续写的,我当时想你们搞政治运动,我不搞。在工作劳动之余,我就利用夜间和节假日,读书作文。

谷竞恒 您那时憧憬过后来的拨乱反正吗?

傅璇琮 那没有,我这个人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远见。我只是发现唐代诗人的生平有那么多问题,是学术本身推动我选择了这个题目。当时很明显,出书并没有钱,不求利,也没有什么名,甚至连能不能出版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特别是《唐代诗人丛考》一篇篇文章写的时候,我真不知道日后能不能出版。

谷竞恒 估计当时其他年轻人也不一定像您

那样刻苦用功。

傅璇琮 总还有有心人,我只是不想荒废时间而已。我对《周易》是爱好的,说来也奇怪,我对里面的忧患意识特别感到亲切。这可能与 I 长期处于逆境有关,我常把《周易》所说的“终日乾乾,夕惕若”作为座右铭,认同那种深切的忧患意识。人生总是有压力的,就我个人来说,二十几岁时就承受过难以想象的政治重压,直到现在,也还不时有一些莫名其妙或所谓世态炎凉之压,根据我早年的经验,这就需要一种“傲世”的气骨。我总是认为,一个学者的生活意义,就在于他在学术行列中为时间所认定的位置,而不在乎一时的社会名誉或过眼云烟的房产金钱。我所仰慕的陈寅恪先生一生也是坎坷曲折的,但他始终坚持以学术自守,“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于友朋”(《赠蒋秉南序》,载《寒柳堂集》)。

### 三、但开风气不为师

谷竞恒 我发现您写过不少篇怀念前辈学者或分析前辈学者治学方法的文章,我觉得您似乎最心仪的学者就是陈寅恪先生。

傅璇琮 陈寅恪先生确实是我非常心仪和仰慕的前辈学者,可惜我没有机会接触过他,但先生的著述是再三研读的。我最服膺的是陈先生独立不阿的人品和沉潜考索的学风。我后来主要是搞唐代,唐代研究的前辈学者对我影响很大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位是陈寅恪,一位是岑仲勉。岑先生注重于史料考证,这对我影响比较大,我好多东西靠它。陈寅恪先生主要是治学思路影响了我,这方面我写有专文。别人对我的学术评价,也讲到 I 继承了陈先生的学术理念,从文化学的角度去搞研究。后来陈寅恪先生的女儿还特意来看我。文化学角度也许可以说是我的一个重点。我觉得陈寅恪先生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学问较重文化学术,而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家本身,文化和文学互相结合。我感觉前辈学者在古典文学研究上已经有非常丰硕的成果,我们应当好好研究20世纪前半叶学者的研究思路。譬如鲁迅先生的名文,作于1927年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研究魏晋时期,并不是建

安七子、竹林七贤,一个个孤立的作家,而是从政治背景、文化环境等方面来研究影响当时文人的普遍心态,他独具慧眼地拈出一个药、一个酒,而不是单列一个作家、单篇诗文,这就提纲挈领、抓住要害了。我听说他本来还要继续讲南北朝文学的,特别是南朝文学,鲁迅也提到两个关键字,一个是佛教的“佛”,一个是妇女的“女”,我觉得这两个字也很精辟啊,确实可以表现南朝的文学特色。鲁迅从文人心态来研究当时的文学与创作的关系,很新很独特。新时期以来,这方面得到了新的推进,南开大学的罗宗强先生著有《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我觉得我们研究文学确实可以把中国的文人士大夫、知识分子作为研究重点,因为文学的主要承担者就是文人。我们不能离开文人、文人的生活道路,包括科举制度、做官佐幕的心态、与当时政治的关系等等,这样才能更好更全面地研究文学。我认为在这些方面,鲁迅、陈寅恪、王国维、闻一多等前辈学者都很好,我们不妨把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好传统研究总结一下,吸收一些好的经验为今天的研究服务。

谷竞恒 您提到的这些学者好像都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为解决一个小考证而钻牛角尖,他们都属于有思想的学者。

傅璇琮 是。现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而应当树立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况,以及作家、士人群体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各自持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追寻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的研究路径。我想起闻一多先生在《风诗类钞》里的一句话:“缩短时间距离,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我觉得闻先生是在以一种综合的文化考察的视野,把昨天的历史用一种整体、流动的眼光,加以研究开发,同样是很具有启示意义的。新时期以来,“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渗透到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如果说,这些年来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真正有所进展的话,那么,彰显文化意识的观念及其在实际研究中的运用,是最可称道的成就之一。

谷竞恒 我觉得您治学和别人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有缜密的计划,给人感觉按部就班,特别有

章法。不像有些人这两年搞这个,等到写出书来就不搞了,过两年又做其他的研究。您在治学的计划上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傅璇琮 我是这么想的:最初我搞初唐、盛唐,旁及中晚唐,而中晚唐和政治联系密切。大家都知道,中唐后和政治紧密联系的一个情况就是牛李党争,于是我就搞《李德裕年谱》。之后,进一步想搞《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为学术界提供方便。后来又想搞《唐才子传校笺》,《唐才子传》当然是很好的书,可惜错误太多,但我一个人搞不了。我想体现当代的整体水平,搞整体研究,于是就请有关学者来做。我比较注意整体研究,策划一个大题目、好题目,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来做,带动某个研究领域的整体水平。后来我搞《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也是贯彻这种想法。

谷竞恒 听刘学锴先生说,林庚先生曾夸赞陈贻焮先生很会选题目,找得准、挖得深,开玩笑说一挖就是一个大萝卜。我觉得您也特别会选题目,您是怎么选研究题目呢?

傅璇琮 没有什么秘诀。其实这和我研究陈寅恪先生也有关系,我在《唐代科举与文学·序言》里讲到,受陈寅恪先生影响,不能局限于文学本身,要从文化的角度,文史结合。我自己做学问,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深感研究古典文学必须文史并治。治史对于治文,是能起去浮返本的作用的。于是在做完唐代诗人考论之后,我想到,把科举作为一个中间环节,将文学和社会结合起来,研究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心理状态。我在研究过程中,又想到两方面:一是唐代文学和幕府的关系,比如李商隐,一生都是幕僚,还有杜牧等;另一就是翰林学士,这是唐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最高层次,对当时影响很大。我提出这两点,自觉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后来戴伟华同志就做了唐代幕府与文学的题目,说明我的想法对学术界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谷竞恒 您对知识分子、进士、士大夫、翰林学士都很重视。后来您写的不少书,都有人跟风,如策论与文学、铨选与文学……您的成果一出来,立刻就成了学术界的标杆了。

傅璇琮 我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在学术界评

价还不错,这种研究思路得到了学界的认同,已经有几位学者从事类似选题的开发研究,这特别让我感到欣慰。前几年四川大学祝尚书教授写了《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让我写序。很多学者让我写序,我多承诺。对于安心学术、不求名利的学者,我特别想为他们表而出之。最近,我新出了一本书《学林清话》(2008年10月大象出版社出版),是把我二十余年来为人所作的序文汇编起来,共辑录了七十三篇。我想,我们古典文学界,无论前辈或中青年学人,能为人作序有如此之多者,恐怕不多见。我写序,是作为学术小品来写的。宋人的《彦周诗话》里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我仿其语气,把序言的体制定为:“辨学术,论世情,记交谊,抒己见,重理趣也。”具体来说,我为友人作序,一是抒“淡如水”的友情,二是述“切于学”的旨趣。不但要写书本身的特点,还有写从中体现出来的学术个性等东西。比如吴伟斌先生从1980年以后就一直在专心研究唐代元稹的东西,他这人有特点,是个不求名利的人,虽然六十多岁已经退休了,但还是孜孜不倦地搞研究。元稹在唐代作家里是研究很不充分的,生平事迹记载的差谬、文学创作评价的错讹,比比皆是。吴伟斌先生发愤著书,就过去对元稹记述、评议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考辨、论证。搞学问要以订讹传信为本,即求真。宋人叶梦得说:“古之君子不难于攻人之失,而难于正己之是非。”治学不在于批判别人,而是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后来吴先生将《元稹考论》、《元稹评传》的书稿邮寄过来,我觉得为这样的沉潜学人的著作写序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谷竞恒 我特别注意到,您的序言,不但有同为同辈的学人写的,还有不少篇是为中青年的学者所作。

傅璇琮 确实如此。我特别注意到,自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往往与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思路、风气极有关系。中青年学者中,不少人都与我有交往,他们身上有一种特有的学术朝气,带来了随着改革开放而培养起来的开阔又敏锐的理论思维。而且很多人在前辈学者的指导下,受过严谨学风的熏陶,有着令人不得不首肯的扎实基本功。对于青年学者,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说:



“要扶上马,送一程。”他们是未来学术的希望。

谷竞恒 从较早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到《李德裕年谱》、《唐翰林学士传论》……您写了那么多书,也有好多人写过研究您治学的文章,您自己觉得哪个概括得比较合适?实证研究还是历史的文化研究?

傅璇琮 治学,一个呢,自己搞学问,现在有个新名词“理念”,要对自己的学术有一个看法,对治学本身先有理念。我为什么搞《唐才子传》?因为我觉得元代的人为唐代的二三百人做传,真了不起。而且后来日本人专门做过,作为中国人有责任把自己的东西搞好,有这么一个理念。为什么做《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因为搞文学史按照现在以时代作家为纲的模式已经很难再有新意,而文学编年史可以理解文学鲜活的、具体的发展历程。为什么做《李德裕年谱》?因为关于牛李党争,以前人们对李德裕各种各样的评价众说纷纭,我想用年谱这种最直观的方式来具体落实。总之,我觉得搞学术先要有一个观念、主题,其次呢,我注重史料、资料价值,要以考证史料作基础。最好把两方面结合起来。

谷竞恒 您是浙江人,浙江在历史上有所谓浙东学派,非常有名。您在史料方面、实证研究上能否说超越了乾嘉诸老?

傅璇琮 我成就有限,不能说超越。浙东学派的杰出学人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为代表,“贵致用、务博综、尚实证”是他们的一贯学风。我们现在做考据,从治学路数来说,如果没有对某一学科做整体把握和考察,没有具备一种综合的科学思维方式,就不可能进入有效的工作程序。在治学方面,我个人希望能够做到“澄其源而清其流”。所谓“澄其源”,就是探寻治学问题的原始材料究竟如何,应当对原始材料作准确的搜讨与把握,而不应该以后起的或已起过变化的材料当作原始材料。“清其流”是指从最初的起因出发,不带任何个人爱好与偏见,把由原始材料生发的种种解释、议论、记载,按照事物的本身发展加以清理,这样做,才能对学术问题的纵向发展与横向联系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概括。我的研究,就是贯彻这种思路,追讨问题的起因,从材料的源头加以澄清,由此进行科学的推理,期望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谷竞恒 我倒觉得,您研究史料考证是为解决问题服务,不像很多清代人为了搞史料而搞史料。可以看出,于平实中创新是您的学术追求。

傅璇琮 这有个现代化的观点问题。实证是一方面,还要有理性的精神。我认为我们还应坚持并发扬前辈学者长期努力而积累下来的严谨学风,追求一种勤奋的实证训练,只有如此,才能支撑我们作大幅度的理论探索。

谷竞恒 下一步先生想搞些什么呢?

傅璇琮 我近年曾做翰林学士研究,同时还主编《历代诗文名著提要》,我觉得搞文学史可以多种途径,书目提要就是其中之一,清朝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历代诗文集,从先秦两汉开始,一直到清代的别集,如果把诗文评也放在里头,一共差不多两千种书,浩如烟海,现在分成五段:两汉到唐代、两宋、辽金元、明清、诗文评,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做分卷主编,并约请人来做提要,介绍作者、内容、版本等。我的想法是,做这么一种系统的梳理工作,对我们今后研究古典文学,研究文学史,不管教学、研究都大有好处。学术研究最好能从长远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为了一时,最好为了后世多做些基础性的工作,夯实根基。

谷竞恒 讲到这,好多人称您是“新时代古典文学研究的总设计师”,您怎么看?大多学者是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您怎么会有这些整体的想法?

傅璇琮 一方面我长期在出版社工作,比较了解学术情况,结识学界的很多朋友;另一方面是我们的题目大些,可以集体来做,促进学术界的整体提升。特别是1982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之后,我一直参与会务工作,1992年后还忝列会长之职,与中青年学者接触更多。我始终认为,古典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当有其完整的结构。这种结构就像建筑工程一样,可以分为基础工程和上层结构两个方面。基础工程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长效性、稳定性的特点。具体来说,基础文献的内容大体有三个范围:第一,古典文学基本资料的整理,这包括各类文学作品总集、历代作家别集的点校、笺注、辑佚、新编。第二,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像作家传记资料的辑集,文学活动的编年,写作本事、流派演变的记述和考



证等。第三,基本工具书的编纂,比如古代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解题,文学典籍专书辞典或索引、诗词词语辞典等等。基础工程太重要了,它不但为深入研究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还能影响研究方法或研究方向的开拓。在这个基础上建筑的上层结构,才是坚固的、经得起学术考验的。

谷竞恒 显而易见,您在治学布局上,是很讲究点和面的结合的,是很讲究层次和条理的,是作了精心的、科学的构想的。您主编的几套文献资料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真正起到了基础工程的作品,比如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那套古代文学作家的资料汇编,现在已经很具规模了,有几十种了,这是以后研究古典文学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之后,《中国文学编年史》立刻上马,可见您的研究思路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

傅璇琮 对。曹道衡先生和刘跃进先生有《魏晋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我给中华书局“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也做过主编,如果多搞若干种,会对今后的教学、研究非常有益,比如唐五代文学史料,我总想着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清代学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自序里有一句话:“予任其劳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人乐其易。”基础性工作实际上是服务性工作,为学术研究服务的。我们做些服务性工作,譬如《唐才子传校笺》也是服务的。我有个观念,不是为了体现自己,而是为做学术服务,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提供可靠史料,我特别想把基础工程搞扎实,那样上层结构才有好的发展空间。新时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有两个明显的进展,一是史料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重视对文献资料的发掘、梳理、考订,另一是研究视野的开拓,从文学扩及整个文

化,理论更新加强。这两个方面同步共进,而且相互启示、彼此受益。以唐代文学研究为例,古代文学研究界已经有一个共识,也就是说20世纪以来,唐代文学最好的研究成果还是出在改革开放之后。回顾我们这一代学者所走过的道路,是很能牵动感情的。上个世纪前半叶有连续不断的战争,后半叶的前三十年又有频繁掀起的政治运动,但是很多学者以难以相信的毅力处理难以容忍的境遇,坚守学术,我觉得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珍视和倡导。

谷竞恒 今天和先生对话非常荣幸,最后我还要为这个对话起一个题目,我读过先生的很多著述,记得已故程千帆先生称赞您“不仅没有重复别人,并且也从来不重复自己”(《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序言),可见您的学术格调是很高的。由此我又进一步联想到陈寅恪先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的一段话:“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继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我个人认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用在您的身上也特别合适。不知您同意吗?

傅璇琮 比起前辈大师,我差得太远。不过,我自想这几十年没有荒废时间,同时我还愿意为学术界做些事情,就像我在《我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那篇文章之前所写的两句话:“我最大的心愿是为学界办一些实事,我最大的快慰是得到学界友人的信知。”如是而已。

责任编辑 山木